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关键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永恒课题”

□ 赵纪萍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课题，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时代课题并科学探索解决之道，是我们党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和经验。其中，有些课题是贯穿各个历史时期并在未来依然存在的，需要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这些课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永恒课题”。对于这些“永恒课题”，我们要深刻领会并积极思考应对之策。

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永恒课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内在要求。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这就要求我们，既立足当前、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把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结合起来，把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融为一体，紧紧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2013年11月24日至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

时候都不能放松。“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古往今来，粮食安全始终是保障改善民生的基本前提，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粮食安全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必须作为永恒课题常抓不懈。尽管我国正处在历史上粮食安全形势最好的时期，但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粮食危机、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的叠加影响下，中国粮食供需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鉴于此，保障粮食安全这个永恒课题丝毫不能放松，必须常抓不懈，牢牢将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上。

2014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作风问题是一个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一阵风、刮一下就停，必须作为永恒课题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充分认识到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充分估计到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既要有常抓不懈的韧劲和耐心，又要构建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通过立破并举、扶正祛邪，不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努力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

2015年5月25日至27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浙江调研时指出，从严治党是一个永恒课题，党要管党丝毫不能松懈，从严治党一刻不能放松。伟大事业需要坚强的党来领导和推动。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始终成为领导核心，就必须一以贯之、坚定不移抓好从严治党这个永恒课题，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为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鲜明政治引领。昂首阔步新征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离不开全面从严治党政治保障和政治引领，必须持之以恒抓好抓细抓实从严治党这个永恒课题，在革命性锻造中把党建好建强，谱写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时代华章。

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唐山市调研考察时指出，同自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与自然灾害共存，人类是在战天斗地中不断发展的。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同自然灾害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坚持对这一永恒课题常抓不懈，更加自觉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防灾减灾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断从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总结经验、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党的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来不得半点松懈。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党的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都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形成了讲政治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大力度抓，形成了鲜明的政治导向，推动党的建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2019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我们党一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忘记初心和使命，我们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坚守初心使命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新的赶考路上，必须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常抓常新，形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维方式

□ 聂锦芳

笔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的“新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融合与重新建构的过程。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具有现实紧迫性。但同时也必须指出，这种“化”的过程将是极为复杂而艰难的。如果不完成这一艰难的工作，就很难谈得上现实化或当代化。

当两种思维方式发生关联的时候，碰撞和辩驳是必然的。那么，当马克思“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发展的时候，他的思维方式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呢？

第一，理解世界的“新唯物主义”态度。

马克思是源远流长的西方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理念和体系中无疑体现和贯穿着近代启蒙主义、科学理性特别是“新唯物主义”精神。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德国古典哲学浸润特别是观念论熏陶后毅然走向唯物主义持有多种评论，但笔者认为，如果放在德国哲学及其社会发展自身演变的进程中透视马克思思想的这种“变革”，其意味和价值更会得到彰显。暂时撇开马克思的哲学思考和创建来看德国哲学的发展进程，我们会发现，当黑格尔把理性主义推向极致的时候，声势浩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立马就崛起了，包括在黑格尔去世之后谢林去柏林讲授的“天启哲学”、青年黑格尔派推崇的“自我意识”，特别是在之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等。也就是说，没有马克思的“新哲学”，作为思维方式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是缺乏过渡、缓冲和超越的。事实也确实是如此，马克思后来被迫流亡英伦，非理性主义主宰了德国的社会思潮和哲学发展，并引发深刻的社会运动，最终延伸至20世纪导致巨大的国家灾难。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突出强调

理解世界的唯物主义原则、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等，目的就在于校正唯意志论、观念论等思维方式的弊端。

第二，“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马克思的“新理性主义”“新唯物主义”又不是一种仅仅认同现实和现状的哲学，而是彻底的“批判性思维”。马克思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最全面、最系统地展开经济学学说史研究并留下完整著述的思想家，《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长时段写作既是卓绝的元理论建构过程，也是他思考、清理和超越古典经济学过程的记录，二者具有极强的内在关联。关于“古典经济学”的阶段划分，在20世纪有几种影响比较大的界定，但无论是主张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演变的“凯恩斯说”，还是涵盖1790—1879年间经济学发展的“熊彼特说”，乃至具体指陈“以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始，到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出版止”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流行的理解，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把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开端。与20世纪的解释不同，马克思关注的视野更为宽广，将古典经济学的起点追溯到斯密之前100年，认为“在英国是从威廉·配第开始”的。在西方经济学研究史上，这是独树一帜的见解。那么，马克思是基于什么做出这一判定的？换言之，配第是在什么意义上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的？主要原因在于配第创立了“政治算术”的概念，首次尝试用算术方法探究社会经济问题，“不是把一连串比较级和最高级词汇同空论拼凑在一起，而是立志要用termus of number, weight or measure（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只利用从客观的经验中得出的论据，只研究as have visible foundation in nature（在自然界中具有可见根据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这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

式”，也就是说，是统计学而不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造就了“政治经济学”，而配第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同时，马克思的批判更体现在深刻的自我反思中，这突出表现在他对《资本论》结构的反复斟酌和修正。作为《资本论》的研究者，有一个问题是始终绕不开的，即马克思为什么最终没有整理出《资本论》第二、三卷？梳理1867—1883年间马克思的著述，我们发现，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到他去世，面对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各种新的复杂状况，马克思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了资本的性质、运动、逻辑及其后果，在身体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做了极其繁杂的工作，写作量大大超过了《资本论》的初稿。换句话说，“没有按照以往的设计完成第二、三卷的定稿工作”这一状况成为理解马克思晚年资本理论的关键因素。尽管他并没有明确表达、概括出这些思考，但其中无疑蕴涵着新的创建，也铺筑了走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运动及其理论分析的通道。可以说，自我批判最终促成了自我超越。

在社会变革、理论风云和思想激荡中寻找创造和突破，也正是马克思给予当代中国最深刻的启示。

第三，顺应历史发展“铁的必然性”和“正在实现的趋势”，从世界总体格局中看待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在19世纪欧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德国曾处于落后状态。也正因为如此，德国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所处的悲惨境况还没有像英国那样充分暴露和展示出来。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当时德国社会中阶级对立的状况“远不是那样坏”。面对这种情形，不在少数的德国观察家和经济学家总是囿于狭隘的视界，站在本国的角度暗自庆幸，或“伪善地耸耸肩膀”，或“乐观地自我安慰”。对此，马克思援引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讽刺诗集》中的一句话不客气地送给

这些人：“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资本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域，将世界推进到全球化时代。这既是必然的，也是充满矛盾的过程，一体化程度加剧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分离和等级。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甩出来，既为世界带来发展，同时也埋下了“苦果”，而且这“苦果”在危机爆发之际会成长、成熟，使世界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更加凸显。这种情况催生、聚集了质疑乃至抵制全球化的声音，并形成反全球化的浪潮。个别国家更设置多种壁垒，推行国家优先战略，试图通过“逆全球化”来摆脱危机。然而，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铁的必然性”，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自觉顺应、积极融入，在此基础上构建开放、包容的国家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世界总体发展，也必然惠及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马克思当年以落后的德国为例，特别批评了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思路，并深刻地指出，从其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创始人威廉·罗雪尔，再到发展者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和卡尔·古斯塔夫·阿道夫·克尼斯等人，他们的学说反映了德国在经济上面临着的复杂任务，体现了思想上的矛盾心态和双重主张。

以笔者阅读马克思著述的体会，深切感到，尽管它们写作于19世纪，即便不论其重大的思想史价值，就对照当代世界变化的情势和社会发展的状况而言，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启示。因此，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和重要的任务。



理论宣讲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武装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集力量的有效手段。现阶段，全国上下正大力开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理论宣讲工作，教育引导全国人民学深悟透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如何更好地适应党的理论创新和人民需求，推动党的理论宣讲既“顶天”又“立地”，是当下急需研究的问题。

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党的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宣讲者不是“搬运工”和“二传手”，必须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才能在“顶天立地”中提高理论宣讲的说服力、亲和力和针对性。理论性要求宣讲者对理论知识了然于胸、运用自如，深刻把握理论知识的逻辑、内涵、外延、实践路径等，把理论逻辑、思维方法、基本概念、主要观点、重要问题讲准确、讲透彻、讲明白。充分发挥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的理论辐射作用，通过集中备课、学习沙龙、示范课讲解等方式，增强讲师团队的脚步力、眼力、脑力、笔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实践性要求宣讲要落到实处，将理论宣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人民群众用理论解释社会现象，指导社会实践，实现人生价值。宣讲内容应贴近生活，少点照本宣科，多点百姓身边事，从身边的小事入手，以小见大，深入浅出地阐述理论知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使群众相信这是一个有趣的宣讲。应提前调研，了解受众的生活实际、所思所想所盼，将宣讲与解决受众“急难愁盼”问题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党的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使群众相信这是一个有用的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鼓舞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朝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发前进。

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

理论宣讲是党理论武装的一部分，宣讲者的主导作用是确保理论宣讲“顶天”的关键，但宣讲要“立地”，就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主导性要求宣讲者用党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真正做到学懂、弄通、悟透、做实。宣讲者只有将党的理论创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理论转化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才能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实现统一。加强宣讲者的主导性和责任意识，使其能够全面客观地研究宣讲内容和宣讲方式等，积极主动、灵活多样、富有创造性地开展宣讲工作。主体性要求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让人民群众从宣讲活动的客体变成主体，激发人民群众在宣讲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要我参加”转变为“我要参加”。宣讲者应由原来的专家领导拓展为乡贤、道德模范、产业致富带头人、文艺工作者等多层次、多领域人才，打造一支群众身边的“草根”宣讲队伍。从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多渠道入手，把党的理论创新具体转化为人们的日常行为举止和工作要求，找准理论与人民生活的共鸣点、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引导人民群众能够在一言一行中践行党的理论。

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新时代理论宣讲工作要求显性

理论宣讲如何做到『顶天立地』

□ 温丽华

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充分运用线上线下的各类平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工作，从而实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宣讲效果。显性教育要求宣讲要有明确的政治性、政策性和导向性。理论宣讲属于宣传思想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与具体要求讲透彻讲明白，用真理、逻辑、规律明确告诉人民群众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隐性教育要求宣讲要找准听众的关切点和兴奋点，将服务贯穿于宣讲现场、宣讲后续跟踪、宣讲效果评估等工作中，使宣讲既有深度，也有温度。站在群众的角度，把“要求群众应该怎么做”转化为“能够给群众带来些什么”，改变传统的单向灌输理论宣讲模式，增强双向互动，根据宣讲场所、内容和受众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宣讲模式。推动新载体和传统载体的融合、线上线下的融合，不断调整内容、创新方法，确保宣讲效果，将大道理讲好、讲实、讲活，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例如，将宣讲内容转化成电影、歌曲、小品、快板、民族剧等文艺表现形式，在轻松的氛围中阐述理论知识。充分运用网络平台，运用微信、微博、网站、手机APP等新媒体载体进行宣讲，将教育内容精短化、视频化、趣味化，多使用“短平快”的宣讲方式，扩大教育辐射面，让理论宣讲“潮起来”。

（作者系广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